

总主编 贾平凹 蒋惠莉

本卷主编 畅广元 段建军

# 作品选

文学理论批评卷 · 下

(1954—2014)

# 陕西文学六十年



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

(下)

文学理论批评卷

(1954—2014)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 文学理论批评卷 / 贾平凹主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 - 7 - 224 - 11466 - 9

I. ①陕… II. ①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陕西省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18. 41 ②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8277 号

## 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 (1954—2014)

### 文学理论批评卷(上、下)

---

总 主 编 贾平凹 蒋惠莉

本卷主编 畅广元 段建军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67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9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466 - 9

定 价 198.00 元

---



# 陕西文学批评六十年扫描

段建军

文学批评是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传播行为，就会出现对这些行为的品鉴和评论。初级的品鉴和评论，往往都是碎片化的感想，有观点没理论，更缺乏系统性。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独特视野、系统理论的文学评价行为。批评的对象可以是作家作品，也可以是文学现象。批评的主体可以是文学创作者，也可以是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活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文学批评者作为趣味领袖，依据自己的鉴赏经验和价值标准，对作品和作家进行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为广大读者选择值得阅读的优秀文本，指出这些文本中诗性智慧的闪光点、独特思想的深奥处，引导读者的审美阅读，启发读者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影响作家反思自己的创作活动，继而影响到作家未来的创作。由此可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力量，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优秀的作家都把批评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从中发现自己创作的衣冠到底正不正，相貌到底端庄不端庄。因为他知道，创作是一种对话，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话语系统里，才能形成共鸣，才能让对

话继续，才会期待新的对话。拙劣的作家不太在乎批评，一种是自恋型的，他把创作当成独白，当作自我表演，旁若无人地进行自言自语；一种是失败型的，他因为创作不成功，得不到趣味领袖们的认可，从此一意孤行。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明确指出，作家必须按照艺术规律写作，认清文章与读者心灵之间的对应关系，用特定类型的文章，去适应或改造特定类型的心灵，愉悦或打动特定类型的读者。只有作家的文章与读者的心灵之间形成对应关系，才能把文章的种子撒播到读者的心中，在读者的心中再长出新的文章，使文章的种子生生不息，以至不朽。文学对话，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的话在对方的心中扎根发芽，另一方面是想在对方的话中寻找新的话题及方式。作家作为对话的主体，总想让自己的话语产生效应，想激发诱导读者的对话兴趣，想把对话进行下去。文学独白，无视批评，无视读者，其创作注定是不能长久的。

陕西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镇，也是文学批评的重镇。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批评界的郑伯奇、胡采、王愚，到80年代雄起的刘建军、畅广元、萧云儒、李星、王仲生，再到90年代以来活跃至今的中青年文学批评家李国平、邢小利、李继凯、杨乐生、韩鲁华、周燕芬等人，陕西文学批评工作者，阐发现实主义理论，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对陕西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思想库的作用。品评陕西优秀作家的智慧风貌，挖掘陕西杰出作品中的诗性智慧，对陕西文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了特定的推动作用。尤其重要的是，陕西批评家在陕西作协的组织领导下，非常注意发掘和培育文学新人，对陕西文学批评梯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陕西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是延安文艺思想。胡采先生曾现场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他一贯的文学观，也是那一代陕西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观。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让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那一代作家和批评家的信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工作，是那一代作家和批评家的信念。用

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那一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理想。

20世纪50、60年代，陕西作家杜鹏程、柳青、王汶石、李若冰等创作热情高涨，分别创作了反映艰苦革命战争岁月和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当时的胡采、王愚等文学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些优秀作品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胡采是陕西当代早期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对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开创功不可没。在整个十七年的文学中，胡采秉持文艺批评坚持党性、典型化、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三个原则，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陕西文学批评者。

20世纪80年代，王愚、刘建军、蒙万夫、畅广元、萧云儒、李星、薛迪之、王仲生等人，成立了“笔耕文学研究组”，对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为代表的一批陕西文学优秀作品进行了新的认识与评价，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文学新星进行把脉，对陕西文学的未来发展进行诊断。评估老一代作家的新价值，挖掘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潜能，引导当代陕西文学的创作走向，对新一代作家的健康成长，发挥了正确的引领作用。这既是我们陕西当代文学一个迅速成长的时期，也是陕西文学批评事业的另外一个高峰时段。此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刚刚开启，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文学界一扫过去十年的文艺阴霾，陕西文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实力派作家，配合当时活跃的文艺现实，文学批评界在继承文学批评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介入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从理论上试图探究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思想的影响，总结新的经验，为推进陕西文艺事业提供思想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陕西的文学批评事业步入了正轨，形成了一支以“笔耕组”为中心的相当规模的文学批评家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坚守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也有主张借鉴西方文艺观念的，不过现实主义批评仍是主流。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批评家所发出的声音非常响亮，作家也愿意并且诚恳地接受批评家的思想观点。80年代中期，陕西文学批评界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刊物《小说评论》，通

过这一理论平台，向全国文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评论》既给陕西培育了一批青年批评家，又宣传和扶助了一批青年作家，更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总之，陕西的文学批评队伍是建设文学大省的生力军，在促进文学创作、发出陕西批评声音、引导培养阅读欣赏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尊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陕西文学批评事业大有作为的时期。一方面畅广元、萧云儒、李星等老一代批评家继续活跃在批评第一线，另一方面李国平、邢小利、李继凯、韩鲁华、杨乐生、周燕芬、仵埂、赵德利、冯肖华等中年批评家已经崛起，更有冯希哲、梁向阳、孙新峰等青年评论家也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的许多批评家具有较好的学术素养，批评视野更加开阔，他们的文学批评更加专业化。同时，文学批评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了。批评视角的多元化，造成多文本内涵挖掘的丰富化，同时也开拓了读者的欣赏视野，显示出文学批评的巨大进步。50年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往往受时代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只进行社会政治批评；80年代前期我们仅限于社会历史批评。而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标准和方式更加丰富多彩。这些批评者在批评的方法上，大胆使用西方后现代理论，对新涌现出来的作品进行解读。在批评成果的呈现上，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对陕西作家有了更加系统和深刻的探讨。

1993年是值得陕西文学纪念的日子，这一年陕西五位作家同时在北京出版自己的大作，引起中国文坛巨大反响，被称为“陕军东征”现象。陈忠实和贾平凹更创作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作品。陕西文学的批评者用成百篇文章、多部专著对此进行探讨评析，产生了重要的批评效应。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商品化进程，当代文学批评也受到冲击，评论界一些人在红包和人情的影响下，放弃了应有的原则。然而，陕西批评界的同仁，能够继承传统，坚持独立思考，坚守批评标准，从文学文本出发，谈成就、谈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作家和作品。

通过以上的大致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对陕西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做如下的总结。首先，65年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的队伍和规模在不断发展壮大。早期的陕西文学批评工作者人数较少，一些人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有些人主要从事文学创作，辅助也进行理论思考，而且

思考得相当深入。有些人主要从事文学批评，附带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作家从事文学批评，提高了作家的理论素养，增加了他今后创作的思想深度。批评家从事创作，丰富了他的感受力，增加了他们对创作甘苦的体验，使他们的批评增加了应有的体温。因此，这种双栖身份无疑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事业是有利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学批评拥有了更多的理论资源，作家也有了更多的文学批评期待。其次，陕西文学批评的对象多元化，方法多样化。众所周知，小说是当代受众最多影响面最大的文体，是陕西文学成就最高的文体，也是支撑陕西文学大省地位的文体。早期的陕西文学批评也将目光主要聚焦在长篇小说上。新时期以来，陕西长篇小说的数量更是以井喷的速度增加，陕西文学批评的目光虽然还是主要集中在小说上，但同时也有所改观。散文批评、诗歌批评、报告文学批评也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成果，有效推动了陕西文学整体的进步。在研究的方法上，文学批评者已经充分调动了一切现有的方法论工具，全方位介入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在形式上，召开学术研讨会、发表批评文章、同作家座谈等不同的批评形式，全方位推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长足进步。

纵观陕西文学批评 60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文学批评者和作家一样，都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矢志不移地坚守传统，所以，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文学成果。三秦大地历史文化悠久绵长，陕西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很多文学批评的视角都是从中国古典美学或者文化传统出发的，在当代文论话语失语的情境下，陕西文学批评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执着坚守自己的批评传统，用自己传统的语言，传达自己的体验与感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陕西文学批评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一种浓重的乡土情结。这既跟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体验有关，也与他们品鉴评价的文学文本有关。陕西的作家和评论家大多是“农裔城籍”人士，文学作品多数是写乡土人生的，文学批评者也是带着自己的乡土意识，介入到作家作品的乡土情结中去的。有些批评者专注于探求作品城乡梳理的心态，有些批评者则专注于小说中的家族书写，有的批评家则对农村人的奋斗与苦难充满了兴趣，分别对它们做了有益的解读。这些都是具有陕西印记的陕西文学批评，是中国

当代文学批评的一道独特景观。

陕西文学批评当然也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例如，我们把太多的注意力都投向了小说，对小说之外的其他文体的关注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陕西固然是长篇小说的大省，同样也是散文大省。我们做过最好的散文杂志，有中国一流的散文作家，也有萧云儒先生这样影响一代人的散文理论家，但是，从总体来说，对散文的关注度很不够，散文批评相对薄弱。其次，在市场化和大众化的现时代中，文学批评的声音多了，但也相对嘈杂了。文学批评又遇到了新的瓶颈，如何解决当前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乱象，恢复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再次，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家作品，但是也不能忘记对批评的批评，因为只有这种针对自我的批评，才有助于批评家自我反思，从而把文学批评做得更好。进一步说，文学批评若能够将矛头指向自己，将文学批评的批评变成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有助于推动我们陕西文学批评事业的持续进步，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编纂本书，是一件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事情，透过它，我们回望陕西文学批评走过的道路，看看我们有哪些成就，有哪些问题，这必将对我们走好未来的路大有裨益。由于我们这套书编纂体例上的原因，那些进入理论卷的作者的文章，不能入选到文学批评卷中，一些非常好的批评家和他们优秀的文章，只能在本卷中空缺，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再如，90年代以来，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同样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 目 录

### 下：文学批评

- 郑伯奇 • 农民诗人王老九和他的诗 / 473  
王 愚 • 气度恢宏与意境深邃 / 481  
刘建军 •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 491  
姚 虹 • 写和读，都是为了战斗！ / 506  
萧云儒 • 路遥的意识世界(论纲) / 510  
王仲生 • 《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 / 532  
费秉勋 • 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 / 545  
董子竹 • 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 / 565  
李 星 • 论“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 / 577  
赵俊贤 • 执着探求的小说艺术家 / 592  
张 华 • 《三秦花边文苑》序言 / 603  
周 健 • 举起“民族新文艺”的旗帜 / 610  
孙豹隐 • “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 620  
薛迪之 • 评《白鹿原》的可读性 / 645  
陈孝英 • 论王蒙小说的幽默风格 / 657  
李建民 • 关于青年题材的创作 / 681  
刘建勋 • 周文与延安文艺大众化 / 685  
王富仁 • 《废都》漫议 / 692  
任广田 • 陕西地区现代文学发展概述 / 709  
冯肖华 • 劲旅的换代与强势的消长 / 714  
李继凯 • 论秦地小说作家的废土废都心态 / 721  
马一夫 • 《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原型及其他 / 744

- 韩鲁华 • 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叙写 / 756  
赵德利 • 家族小说的搁浅与展望 / 776  
邢小利 •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与文学地位 / 782  
李文 • 批评是缄默的 / 800  
李国平 • 批评的命运与批评家的品格 / 808  
常智奇 • 文化在白鹿精魂中的光色 / 814  
沈奇 • 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 / 823  
张志春 • 审美勘探 / 831  
龙云 • 过去的故事:叶广芩家族系列小说 / 841  
刘应争 • 《白鹿原》与乡绅社会的衰落 / 849  
杨乐生 • 西北有高楼 / 874  
周燕芬 • 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 / 884  
炜评 • 批评人格的自渎与自救 / 904  
穆涛 • 散文观察 / 916  
张艳茜 • 对“根性”的痛切关注 / 943  
梁向阳 • “大散文”:意象阔远的散文天地 / 947  
郜科祥 • “意境叙事”的实验及其成功范例 / 960  
冯希哲 • 杨柳列岸风香透 / 977  
孔明 • 梦读《白鹿原》 / 984  
姜彩燕 • 《古炉》中的疾病叙事与伦理诉求 / 986  
高俊林 • 一位文坛旁观者看陕西作家 / 998  
赵林 • 地方知识与文化形构 / 1004  
韩蕊 • 《古炉》的视角和超越 / 1021  
孙新峰 • 三个人的文学风景 / 1031  
杨辉 • 小说的智慧与余华的经验 / 1042

## 农民诗人王老九和他的诗

郑伯奇

陕西有一位农民诗人祁守业写道：

盘古初分到如今，  
谁见农民当诗人？  
中国兴起共产党，  
农民歌手多如云。

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农民中间已经出现了不少歌手和诗人。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广大农民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成立了举世瞩目的人民公社，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男女老少，无不心情舒畅，气象轩昂；于是在扫盲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涌现了无数优秀的民歌手。

去年下半年以来，民歌由轰轰烈烈的运动转向深入了，诗歌创作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新形势下，群众远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迫切要求提高，有名的农民诗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群众取经的对象。老诗人王老九就是其中的一个。群众对于王老九的优秀诗歌差不多都能朗朗上口，对于他的创作才能表现出由衷的钦佩。白庙村青年妇女李玉兰对王老九说：“你的诗把我们心眼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又说得那么巧。”我觉得这是农民对于王老九的诗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评价。

如今，趁《延河》月刊社编辑的《王老九诗选》出版的机会，我想谈谈王老九的人和他的诗。

1959年初,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王老九向诗人们挑战,他唱道:

我老九,六十六,写诗要走人前头。  
摆下擂台哪个打,谁打都是诗朋友。

——王老九摆擂台

这完全是诗歌队中老黄忠的气派。可是,在10年前,再追溯到20年前、30年以前,那时候的王老九,真像他所形容的,还在“阴山底下压着哩!”

王老九是陕西临潼相桥区北王墕人。家世务农,16岁读过一年书,因家穷停学,又在小店铺当了一年学徒,以后就一直做庄稼。关中一带盛行“秦腔”,农民都喜欢唱几句“乱弹”,王老九也不例外。他爱看“戏本子”,从那里学来了许多知识,也吸取了不少艺术营养。从32岁起,他学着编快板,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教育农民。1921年前后在陕西有个政治土匪郭坚,到处抢劫焚烧,破坏农村,群众恨之入骨,王老九编了个“跑郭坚”的快板,揭露郭坚匪帮的罪行,农民听了无不欢迎。他的快板出名了,他的祸事也就临头了。但他并没有向旧社会屈服。

1949年10月,地方党政在相桥镇上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秦颂丞的侄子秦世简。王老九走上主席台,在群众面前说了一段快板揭露秦颂丞的罪恶,倾吐了当地农民多少年来壅积在心头的苦水。中共临潼县委书记董世峰同志听了他的快板,就约他到相桥区委谈话,并抄下他的快板,过了一个星期,《群众日报》(当年西北大区的党报)就把那首快板的前六句,题为《秦颂丞的画像》发表了。这段快板非常形象而概括地画出了一个恶霸的凶恶面貌:

秦颂丞,大恶霸,相桥为王坐天下;  
狼心狗肺老虎牙,猪脸猴眼灰头发,  
两腮无肉尖嘴巴,睁眼不认他干大。

1950年10月，人民政府在相桥开了渭北12个镇的公审大会，将秦颂丞和他的狗腿子枪决了。会后，《群众日报》记者要王老九将公审情况编成快板，这就是那首《除了肚里大疙瘩》，三天以后在报上发表了。

从此以后，王老九的快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当地党政机关经常请他参加各种会议，向他讲解政策。《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和《陕西农民报》都常请他编写快板，并派记者具体帮助。1951年，他又被邀请到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这一次，王老九大大开了眼界：他参观了许多新工厂，访问了文艺机关和团体，跟参加会议的西北五省的文艺工作者交了朋友。人们称他为“农民诗人”，他感到很大的荣幸。他更加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学文化。经过一个时期的苦学之后，他大体上可以自编自写了。这给他在创作上带来了很大方便。

这一时期，王老九写了不少热情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解放军，歌颂新人新事的好诗。像《想起毛主席》《唱不完的歌》《张玉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有名的《进西安》是在西北文代会时候写成的。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宣传政策的作品，其中，像《张老汉卖余粮》可称代表作。在不断的写作实践中，他的创作能力大大提高了。

1953年，他进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大会。由柯仲平同志推荐，他在大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诗。会后，见了毛主席。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进北京》。1954年，通俗读物出版社编印了《王老九诗选》，把他四五年来的好作品推荐给全国读者。他写了一首《自序诗》，概括了自己的身世，表示了自己创作的心情。

王老九在这种精神振奋的情况下，怀着感激的心情，不断地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鲜事物，打击坏人坏事，为社会主义做宣传。他在《我的决心》第二段写道：

我的笔就是机枪，我的诗就是子弹；  
我要打垮一切反动派，我要为社会主义做宣传；  
要编诗歌飞满天，保卫人民的锦绣河山！

因为他有这种战斗的热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才能写出

《歌唱三户贫农》那样动人的诗，又在长诗《王保京》中刻画出一个青年农民的共产主义品质。在“大跃进”时代，他写了《唱了跃进歌》等许多诗篇。

1958年7月，他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和毛主席照了相，握了手。他感动极了，写了《伟大的手》一诗，用这样四句开头：

毛主席和我握了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  
心窝里飞来五彩凤，贴心的歌儿唱出口。

王老九就是这样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国庆十周年的时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多唱出些“贴心的歌儿”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新版《王老九诗选》是《延河》编辑部由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王老九诗选》和东风文艺出版社的《东方飞起一巨龙》等书精选的，并把长诗《王保京》也编了进去。连《自序诗》在内，共有长短诗29首。篇末附录了王老九的《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这是王老九的诗歌的一部较为精美的选集，也可以看作迄今为止的农民诗歌的一个里程碑。

我不想将所选的诗歌一一加以评价，也不想特别介绍某一作品。我在这里只想简单地谈谈王老九在诗作中的某些成就和特点。

首先，比起一般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更深刻地表达了农民的思想感情。其次，王老九的诗从多方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农村的新面貌。他不仅热情地歌颂了新人新事，而且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些新人物的可爱形象，如张玉蝉、王保京、王德生等。最后，他在形式方面，也突破了一般的民歌的调子，接受了新诗的活泼自由的长处。这些都可以说是王老九在诗作方面的成就。当然他的成就也许还不止于此，但由于以上这几点，许多农民诗人都表示衷心的钦佩。

王老九的诗能够获得以上的成就，主要有下面的一些特点。

第一，王老九的诗都充满了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白庙村有个妇女陈凤英说得好：“磨子转来转去，老是围着轴转；老九编的诗，你细听吧，说来说去都是说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叫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越发觉得共产党、毛主席的可爱。”这话非常

巧妙、形象而又中肯。在这部选集中，专门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就占半数以上，其他的诗，归根结底也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在王老九的诗里，像《想起毛主席》《唱不完的歌》《进北京》《伟大的手》等诗更突出地表达了对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因而成为广泛流传的杰作。

第二，王老九的诗结合运动，结合生产，为政治为生产服务，深受农民喜爱，对农民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有个农民说：“老九的诗，实际得很……没一句虚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熟悉农民生活，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感情。王老九年纪大，在旧社会活了 58 岁，受尽苦寒，对地主富农和坏人，他有刻骨的仇恨；到新社会，他“翻身又翻心”，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热爱，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主张写诗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大”，因此，他表现农民生活，不仅真实、仔细、丰富、亲切，而且还能表达出农民内心深处的东西。

第四，掌握农民语言，并善于运用农民熟悉的成语。王老九的语言，丰富、生动、精练、准确。一个农民说：“老九的诗有三个特点：土、巧、细。土是话说得土，尽是咱农民的话；巧是比方得巧；细是说得仔细。”白庙村 65 岁农民金子明说：“老九诗里的比喻，尽是咱农民看的、经的，一看就懂。‘芙蓉树，两股权，中苏人民是一家’，看比得好。又像把秦颂丞、胡宗南比作两扇磨扇子，把百姓的骨头都磨碎了，把反动派的残暴罪恶，一下子都描出来了。”王老九非常重视比喻，他说：“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话就有力量；有时十句话都说不清的，一个比喻就说清了，还有劲。”（《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现在经金子明这么一说，我们知道，王老九善用比喻和他熟悉农民生活语言也是分不开的。至于说得仔细，也是一样。譬如他写张玉蝉给志愿军做鞋袜：

底子厚，帮子坚，蚂蚁针尖纳上边；  
袜跟圆，头头尖，绣个孔雀戏牡丹。

这样细腻的描写，不仅由于观察得仔细，实际也是由于诗人非常

熟悉生活的缘故。

王老九善于运用农民常见的成语格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像《张玉蝉》诗中，形容她做面条的精巧，诗人唱道：“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这形容得多好，可这是农村妇女形容巧媳妇时说的话。又如《大声歌唱王德生》中的一句“一勤天下无难事”。其实这是一句格言，旧时用作对联的上一句，下联是“百忍堂中有太和”，就成糟粕了。王老九把上联用在诗中却显得很恰当。

第五，概括力强，形象集中，显得表现有力。像《除了肚里大疙瘩》的头一段，用六句概括地刻画出恶霸秦颂丞的凶恶形象，非常生动有力，当时《群众日报》题作《秦颂丞的画像》，单独发表，不是没有道理的。又如《歌唱三户贫农》，他只用了这么四句：

这个社好比灵芝草，  
出土露面苗苗小；  
毛主席担水及时浇，  
一夜长得比山高。

这四句多么概括有力。在这概括的表现后面又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思想和多么坚定的信念，而且这又是多么好的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例子。

第六，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表现手法和恰当的比喻是民歌和一切民间文学的特点，而王老九的诗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上面举的《歌唱三户贫农》的那四句诗，也可作为这些方面的例证。那里面有想象，有夸张，也有比喻，而且都很突出。

民歌运动开展以来，一度发生过过分夸张、想入非非的偏向，但在王老九的诗中还是不多见的。

第七，有人认为王老九的诗气派大；除了上述的概括、想象、夸张等手法以外，渲染、烘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进北京》一诗，贯串着我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激和爱戴。他在开头两大段反复描写这种心情，第四大段中间还插入了和毛主席会面的梦境；出潼关，过河南，他心急了，他在第六段更强调了一番：